



中国哲学史丛书

司
馬
光
學
述

陈克明著

K825.8
17-5

中国哲学史丛书

司 马 光 学 述

陈 克 明 著

F0421/63
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B 672535

司马光学述

陈克明 著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4.5印张 5插页 26.4万字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 500

ISBN 7-216-00546-5

B·51 定价：6.80元

(照排胶印)



司马光

贺飞白绘

出 版 说 明

《中国哲学史丛书》是发表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一套书，每本十万字左右。它包括哲学史上专人研究、专书研究、专题研究、思潮研究以及哲学古籍校勘和注释等。

丛书的编辑工作，由丛书编辑委员会领导。其成员为：张岱年、石峻、任继愈、冯契、辛冠洁、邱汉生、王明、艾力农、肖策父、曾乐山、袁尔鉅、陈俊民、贾顺先、吕希晨、陈克明。

丛书编辑委员会召集人为辛冠洁。

丛书的主编为陈克明。

序

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。他的史学成就是人所共知的，他所编撰的《资治通鉴》受到宋元以来绝大多数学者的赞扬，是一部不朽的名著。他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多年以来曾受到很多人的訾议，近年来才有一些同志为他辨诬，论证司马光并非顽固的守旧派，只是政见与王安石不同而已。但司马光晚年受命作相之时，全盘否定新法，在当时已引起苏轼的争议，可以说是操之过急了。司马光在哲学方面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，他特别推崇扬雄，对于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都作了注释，写了《迂书》、《中和论》等论著，还有《潜虚》、《易说》，虽然是未完成的书稿，也提出了一定的哲学见解。南宋初年，朱熹作《六先生画像赞》，把司马光作为六先生之一，与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并列。但是朱熹编纂《近思录》，仅选录了周、张、二程的遗书，不再列举马、邵了。这主要因为司马光的哲学思想还没有构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。司马光编撰《通鉴》，历时十九年，耗费了巨大的

精力；在此之前和之后，他主要在政府任职，从事于行政事务。他的经历与周、张、二程比较偏重文化教育的有别，所以成就各异了。但是司马光的哲学观点也还是值得注意的。

陈克明同志潜心研究司马光的学术思想，考察了全部有关历史资料，对于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比较周密的探索，写成《司马光学述》一书，书中对司马光的哲学思想阐述特详，弥补了中国哲学史论著的缺欠，这是关于宋代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。陈克明同志以书稿征求我的意见，我看了以后觉得此书确有很多的独到之处，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爰书所见，作为弁言。

张岱年

一九八七年四月于北京大学

目 录

叙 论.....	1
第一章 生活经历.....	30
一 家世出身.....	30
二 幼年传闻.....	39
三 仕途变迁.....	43
四 著述生涯.....	87
五 晚景芒寒.....	116
第二章 政治主张.....	137
一 陈述治国纲要.....	138
二 关心军备方针.....	151
三 设计财经工作.....	167
四 建议改进科场考试制度.....	182
五 参加修治黄河决口的商讨.....	188
六 卷入量刑争论.....	199
七 反对新政改革.....	205
第三章 哲学思想.....	248
一 深受扬雄哲学思想的影响.....	249
二 提出“天人共济”等观点.....	317
三 对部分理学范畴的试探.....	328

四 对待佛、道两教的态度	340
五 对人生问题的处理和观察	347
六 关于《疑孟》	356
七 关于《潜虚》	365
八 关于《易说》	379
第四章 史学观点	409
一 帝王史观	413
二 生民史观	423
三 突破传统“正闰之争”	430
结束语	441
附： 本书引用书目	451

叙 论

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，汉、唐两代处于盛期，发展至宋代已经处于中晚期。若从武功的建树和发扬来看，宋代不如汉、唐的矫健雄强和生姿摇曳。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，思想学术的朝气蓬勃，不仅做了许多前人未曾做过的工作，而且走在世界的前面。因为宋代人材辈出，思想活跃。例如王安石、司马光等杰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他们的忧天忧国之情，民胞物与之概，完全相同，但对某些治国方案的提出不太一致，而其终极目的和设想又很接近，都想使国家走向富强。也可以概括为“百虑而一致，殊途而同归。”绝不是什么“两条路线”的斗争，更不是什么“代表两种阶级利益”的斗争，他们的分歧是方法之争，意气之争，或者“君子之争”。扬马抑王固然不对，扬王抑马也不太妥当。为了说明有关问题，必须首先回顾和概述宋代的简况，然后才可能看出司马光一生言行的背景，并作出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评价。宋代社会的特点很多，不可能细述，归纳一下，应该评介以下四点：

1. 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

宋人为着管好国家，他们总结了唐及五代的经验教训，认为必须加强中央集权，在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之下，“三师三公不常置，宰相不专任”（《宋史·职官志序》）下面分设政事堂和枢密院，由他们分掌大权：政事堂管民政，枢密院管军事，另外设置三司使管理财经。形成为三套马车式的中央最高管理机构，他们只能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意旨办事。后来发展的结果是：“故中书令、侍中、尚书令不预朝政，侍郎、给事不领省职，谏议无言责，起居不记注。中书常缺，舍人、门下罕除，常侍、司谏、正言非特旨供职，亦不任谏诤，至于仆射、尚书丞郎、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”（同上）。换句话说，官位虚设，常不实授；即使实授，又不掌握实权。为了完成某些临时任务，只好另外派人，即“别为差遣，以治内外之事”（同上）。当时官场中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：“仕人以登台阁，升禁从为显宦，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；以差遣要剧为贵途，而不以阶勋爵色有无为轻重。时人语曰：‘宁登瀛，不为卿；宁抱椠，不为监’。”（同上）这种京内官无职守、无言责的虚设现象，专靠临时差遣要员去完成主要任务，在任务完成之后，又常常遭到撤销。当时最高统治者之所以不惮烦剧，无非是便于个人意旨的推行，并通过黜升的机会，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。至于宋代京外官即地方官也有较大的改变：“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，颇用文臣知州，复设通判以贰之。阶官未行之先，州、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；阶官既行之后，或带或否，视为优劣。”

(同上)又说：“宋初，革五季之患，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，赐第以留之。分命朝臣出守列郡，号权知军州事，军谓兵、州谓民政焉。”(《宋史·职官志七》)故宋代京外官常带有“权知”、“提点”、“提举”或“经制”等字样^①，也含有临时差遣或选派的意思。“由是内外所授官，多非本职，惟以差遣为资历。”(《宋史·选举志四》)故宋代不论京内官，或京外官常多加上“差遣”两字，其目的还是为了强调皇帝一人的控制，即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，这种现象在以前各代是少见的。

文官既然这样使用，但武官又怎样安排呢？《宋史·兵志一》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。它说：“藩镇盛而唐以亡，更历五代，乱亡相踵，未有不由于兵者。太祖起戎行，有天下，收四方劲兵，列营京畿，以备宿卫；分番屯戍，以捍边圉。于时将帅之臣，入奉朝请；犷暴之民，收隶尺籍。虽有桀骜恣肆，而无所施于其间。凡其制：为什伍之法，阶级之辨，使之内外相维，上下相制，截然而不可犯者，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，而其所惩者深矣。”宋太祖即位不久，他在建隆二年(961年)，鉴于唐及五代藩镇专权之祸，通过“杯酒释兵权”^②，解除了石守信、高怀德等同时起义将领们的兵柄，出为节度使，并厚加赏赐(见《宋史·

①例如“提点刑狱公事”，“提举常平司”，“经制边防财用司”等。

②《宋史·石守信传》指出解除兵权为“乾德初”。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二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二均载于建隆二年。似以后者为确。又详见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卷一。

石守信传》)。这也是收回兵权并加强中央集权的部分措施，而且还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。《通考·兵考四》也说：

“太祖、太宗，平一海内。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天下劲兵，列营京畿，以备藩卫。其分营于外者曰就粮。就粮者，本京师兵，而使廪食于外，故听其家往。其边防要郡，须兵屯守，即遣自京师。诸镇之兵，亦皆戍更”。实际宋代兵制的建立大致分为四种：其一为禁军，用来保卫京师，奉命出征，它是军队的主力；其二为厢军，用来保卫诸州要镇，也常常调动；其三为乡兵，用来防守地方；其四为蕃兵(藩兵)，通过团结训练，然后纳入编制。(见《宋史·兵志一》)

宋廷对士兵的训练则采用“更戍法”，即不断来回调动，使之有劳有逸，将不专兵，兵不骄惰，这也是针对藩镇割据时代兵骄将横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。故《宋史·兵志二》又说：“先是太祖惩藩镇之弊，分遣禁旅，戍守边城，立更戍法。使往来道路，以习勤苦，均劳逸，故将不得专其兵，兵不至于骄惰。淳化、至道以来，持循益谨，虽无复难制之患，而更戍交错，旁午道路。议者以为徒使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缓急恐不可恃。神宗即位，乃部分诸路将兵，总隶禁旅，使兵知其将，将练其士，平居知有训厉，而无番庶之劳，有事而后遣焉，庶不为无用矣”。这说明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后，对更戍制度也有所改进。但为时较暂，积习难除，兵将关系，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协调，还经常引起争议。步调既然不一，一旦遇到用兵，

难免力不从心。这也是宋代积弱的原因之一。

宋初虽然一度恢复了唐代的节度使制度，用来安置老臣或武将。但为时较短，通过迁徙、致仕等办法也逐渐予以撤销，除中央派出的文官充任知州、知县外，财政则由三司使特派转运使掌握，“虽节度、防御、团练、观察诸使及刺史，皆不预签书金谷之籍，于是财利尽归于上矣”。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二)说明宋代财政的收支也完全由中央高度集中进行管理和支配。

在开科取士上，不论文武进士，最后必须通过殿试，始能称为“及第”。在法制建设上，凡属大辟刑狱，必须“录案闻奏”，付予刑部详覆，以免滥杀。这些规定也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反映。

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或改进，往往有利则有弊，而且利弊又常相连，问题的判断只在于利多或弊多而已。以宋代改革兵制而论。金兆丰认为：“禁、厢、乡、蕃四种，禁、厢皆出于召募。而禁军独盛，其调遣、出戍要塞之防卫并寄焉，内外禁兵，总于三衙。而兵籍虎符，则枢密掌之，虽矫唐末五代外重之弊，集权中央。其弊则天下之大，又不啻天子自为战守也。”(《中国通史·兵政篇》)此处所谓“天子自为战守”，即指对军队的调遣和作战的部署等等均由身居深宫的天子作出决定。这样做，既不相信臣僚，又不相信将领，难免作出主观、臆断的裁判。后来宋高宗虽对岳飞一再表示：“有臣如此，顾复何忧！进止之机，朕不中制”。“设施之方，一以委卿，朕不遥度。”

实际这是宋高宗一时安抚武臣的应酬话。不久，岳飞出兵痛击金人，接连取得胜利。秦桧恐其阻挠和议，乃怂恿宋高宗用金牌十二召其班师。（见《宋史·岳飞传》）功败垂成，令人气短气愤！所谓“朕不中制”，“朕不遥度”，纯粹变成欺人之谈。从某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中央集权产生的副作用。所以张浦在评论“收兵权”时曾说：宋室南渡，“贼桧为金人反间，纳范同之策，召三大将入朝，尽收兵权，谬附前说，则又开门揖盗者矣！”（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二）过分强调中央集权，不论政权、兵权、财经权等等，通通掌握在一人之手，不可能不产生副作用。

2. 少数民族矛盾严重对立

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。各个民族之间有分有合，有战争，有妥协，它经过二、三千年的努力，始成为今日比较统一的大国。

殷、周时代，汉民族主要聚居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。西周厉王时代曾受~~猃~~狁所逼，攻入镐京。至幽王时代，镐京又被戎人占领，平王被迫东迁洛阳。进至春秋、战国时代，中原地区分裂成为几百个小国，不时引起战争。对四面包围的少数民族，当时简称他们为“东夷”、“南蛮”、“西戎”、“北狄”，而“东夷”、“南蛮”的背后紧靠着东海和南海，他们回旋的余地不多，通过战争和同化，到了战国末年，乃出现吴、楚等大国，所谓“东夷”和“南蛮”这时只得逐渐与汉民族同化，成为一体。而西北戎人和狄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，他们背后有广大的草原和沙漠作为屏障，

而且与欧洲大陆相通，大有进攻退守的余地，故始终成为汉民族的劲敌。战国末年，赵、韩、魏、燕分别建筑长城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族的入侵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又在原来建筑长城的基础上进行连接或新修，使它成为世界著名的万里长城。其所以这样做，也还是为了抵御匈奴族的进扰。汉代武功较盛，到了武帝时代，除南通南越外，乃先后派张骞、班超等为使节前往西域活动，使五十余国次第内附。其力量曾经达到葱岭一带。他们这样做，也还是为了联合西域用来对付北方的匈奴族，可见匈奴族始终成为汉代的隐患，当时只好采取和战并用的对策。到了三国时代，汉民族内部矛盾激起，战争频仍，出现魏、蜀、吴三国鼎峙的局面。这时西北少数民族乃乘机大量内迁，深入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北等腹地，其中最大的为匈奴、羯、鲜卑、氐、羌，也就是晋代以后常称的“五胡”。实际匈奴、羯为一族。他们聚居今内蒙古一带，氐、羌为一族，他们聚居今西藏、青海一带，鲜卑则另为一族，多聚居今吉林、辽宁一带。西晋约五十年，但稳定的时间较短，力量仅及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和长江流域。接着“八王之乱”，“五胡乱华”等纷至沓来，又形成为南北朝的对立。南朝内部斗争激烈，先后出现宋、齐、梁、陈等五个朝代，当然给少数民族以发展的机会。北方所谓“五胡”也通过近百年的战争、合并，最后乃出现北魏，北魏占地较宽，相对稳定，向慕华风，不断汉化。后来又分成为东魏、西魏，力量逐渐削弱。隋文帝乘机而起，统一南北，为建

立隋、唐大帝国奠定了基础。唐承隋制，武功较盛，力量东及高丽(今朝鲜)，并与日本交往，日本也深受唐化。西及中亚细亚，远达波斯、印度，并建立了联系。南及吐蕃、南诏、越南、暹罗，他们也曾内向。北方回纥一度臣服于唐，曾尊唐太宗为“天可汗”。(见《旧唐书·太宗纪》)至唐玄宗开元年间，达到盛期的顶峰，一度成为东方的大帝国。但好景不长，安史乱后，燕云十六州被其余部盘据，后来始终成为跋扈的藩镇。继而回纥属部沙陀崛起，乃与吐蕃、南诏联成一气，又变成唐末的隐患，加速唐代灭亡，接着即出现五代十国的对峙局面。

根据上面这段简单的回顾来看，秦、汉以前的汉民族尚不占主要的统治地位，秦、汉以后的汉民族处境有所改变，但在不断发展和扩充中，除占领黄河、长江两流域外，后又扩充占领珠江流域。它的力量所及，西南达到今越南和西藏，西北达到今新疆、蒙古和东北三省。中国现有版图，到这时已经基本上形成。也就是说，汉民族逐渐取得了主要的统治地位。但宋以后的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，东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其力量不断加强，始终成为宋廷的劲敌。

当时与宋廷对立的少数民族主要为辽、金、西夏，后来又有蒙古。辽的祖先为契丹，它实际是鲜卑的后裔，长期占领蒙古东北部，隋、唐时代曾受羁縻，安史乱后乃乘机向南扩地。至五代时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威制各部，力量转强，称帝建元，后唐竟尊之为叔父。其子耶律德光